



談陶行知鞠耕於鄉村教育的精神本源 ——從陶行知給操震球的覆信說起



文 | 丁水娟 茅佳清

1927年春天，正在清華大學學習教育心理學的操震球在《新教育》雜誌上看到了陶行知《南京試驗鄉村師範學校章程》、《中國師範教育建設論》、《鄉村教育運動宣言》等文章，深受影響，萌發了離開清華到曉莊師範就讀的意願，並寫信給校長陶行知表達自己的志向。不久，陶行知覆信操震球。

在覆信中，陶行知寫到：“繼續留在清華，有大學畢業文憑，將來還能出洋留學等等。如果去了曉莊，便要失去了這一切，曉莊的‘南京試驗鄉村師範’是沒有文憑的，……將來的工作是要下農村的。”“……從北京到南京，（如同）從皇宮似的清華，到荒山坡茅草篷的曉莊。”陶行知讚揚了操震球“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自我犧牲精神，同時說明了農村師範生活的艱辛：“田家生活

是蠻幹的，你願意嗎？你能打赤腳在爛泥裡奔走嗎？你不怕把雪白的臉曬得漆黑嗎？你不怕軟手上起硬皮嗎？你不怕在風霜雨雪裡做工嗎？你不怕挑糞嗎？你願意和馬牛羊雞狗豬做朋友嗎？”……陶行知還指出鄉村教育是一項長期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也許你親眼看不見（鄉村教育的成果）。要到令郎令孫的時代才能看見，你能忍耐嗎？”，力勸操震球“慎重考慮一番再行決定”，“倘使這番考慮之後，你決意要來投考，我們萬分歡迎。”然而，操震球在“把信反復讀了幾遍”後，“被陶行知先生的精神力量征服了，更覺得非去曉莊不可”，最終毅然決然地離開清華大學，成為陶行知的學生。

陶行知是中國近代的外交家、演說家、書法家、音樂家，更是著名的教育家。他不僅在中國有名，

在世界教育界也很有名氣。正如日本友人齋藤秋男說：“陶行知不僅屬於中國的，也是屬於世界的。我是一個日本知識份子，戰爭使我陷入了彷徨、苦悶之中，不知該如何生活，該走怎樣的路，我從陶先生身上受到了鼓舞，明確了人生的真諦……”。綜觀陶行知的一生，對其形成生活教育理論與開展各種教育實踐產生重大影響的，主要有三大群體：江浙教育前輩群體、哥倫比亞大學師友群體、進步學生群體。這三個“朋友圈”群體對陶行知的人生定位、價值取向、理論創新與實踐追求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在江浙地區，他接受的是中國的傳統教育及其初步的對基督教文化的了解；在哥倫比亞大學，陶行知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教授杜威的兩個中國高材生之一（另一人為胡適——筆者注），他受到的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近代教育理論的培養；他毅然謝絕校方請他繼續留學深造的邀請，踏上了投身教育，報效祖國的神聖之路。回國後的陶行知，以他之所知，本可以轉身而為人上之人；那時的陶行知，以他之所學，本可以談笑於鴻儒之間；但他卻選擇做一個普通的教師，先在校擔任教授，後把目光死死盯在了中國的最底層社會；他離開了高校，捨棄了月薪四五百元的高工資（當時一個高級警員的月工資不到二十元，一個保姆的工資才一元）和城市優裕的生活，到只有幾戶茅棚的南京北郊創辦了曉莊鄉村試驗

師範，吃的是粗茶淡飯，住的是土牆草房，睡的是稻草地鋪，穿上草鞋與師生們共同開荒，勞動建校。他在教學新知識的同時又從進步的學生群體中受到啟發與感知，最終構成了系統的教育理論，並以此教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先進學子，甚至影響着今天的教育理念。陶行知說，我就是中國一介平民。幾十年的學校教育把我往西方貴族的方向漸漸拉近，而經過一番徹悟，我就像黃河決了堤，向中國平民的道路上奔湧回來了。

陶行知說：“人生天地間，各自有稟賦。為一大事來，做一大事去。”他把畢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中去，確實做了一件“大事”——平民和鄉村教育運動，卻因“勞累過度，健康過虧，刺激過深”，於1946年7月25日患腦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歲。

陶行知的這種超凡脫俗的教育理念與身體力行的忘我教育實踐，使其薈聚了近代中國一批教育名家共同推進教育改革，更吸引了大批有識青年成為其杏壇弟子。正在清華讀書的操震球就是這其中優秀的一員。

操震球也是安徽人，1925年考入清華大學教育心理學系。捨棄人們孜孜以求的著名高等學府清華學籍去曉莊師範就讀，對於出身於農家的操震球來說也並非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因為要致力於鄉村教育，其代價是巨大的。當時中國的鄉村，貧窮落後，生活條件極差。操震球放棄清華不讀，卻到鄉村受苦，既不符合家庭供養讀書的目標，也並非是其個人寒窗苦讀的初衷。那麼到底是甚麼力量改變了操震球，讓他能夠放棄個人美好的“前程”、捨卻愜意的都市生活，獻身於鄉村教育呢？應該說是陶行知先生的辦學理念和為鄉村教育付出大愛的示範作用對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既然陶行知作為一個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歸來的高材生，可以捨棄優越的城市生活，轉向條件艱苦、收入微薄的鄉村，終生致力於平民教育和鄉村教育，那麼作為中國名校的高材生更可以投身其門下，共同推進中國教育改革運動。於是，1927年操震球來到只有幾間茅屋的曉莊，集聚在陶行知中國教育改造的大旗下，並從陶行知先生獲得教育的真諦。《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答操震球之問》、《生活即教育——再答操震球之問》、《社會即學校——三答操震球之問》等師生之間的一問一答可以看出，操震球因此而領悟了“教學做合一全人類教育歷程之真相”，明白了“生活即教育是叫教育從書本到人生的，從狹隘到廣闊的，從字面的到手腦相長的，從身體到身心全顧的”，體味了“社會即學校”，知識分子可以拜工人、農民等一切人為老師，來改造教育，改造社會等種種中國教育改造的內涵與魅力。在

陶行知的直接引導與教育下，聰穎的操震球成長很快。因此，當1928年國立浙江大學決定創辦湘湖師範學校時，陶行知先生推薦了26歲的操震球出任，並為操震球赴湘湖師範親書3副對聯：“以社會為學校，奉萬物作宗師”；“以教人者教己，在勞力上勞心”；“和馬牛羊雞犬豕作朋友，對稻寂麥黍稷下工夫”，以勉勵震球及校友。操震球奉命擔任湘湖師範第一任校長後，每月的工資有七、八十元，但他只拿十六元生活費，其餘全部捐獻給學校建設；他還與湘師師生一起櫛風沐雨建設校舍，忍受蚊叮蚋咬，飽嘗辛苦，以至累得吐血成疾，但在病榻上仍掛念湘師建設。

陶行知及其學生們不計個人得失，不怕蚊叮蟲咬，不懼政治迫害地掀起一場民國時期轟轟烈烈的鄉村教育運動，這是怎樣的一種精神境界；作為運動旗手和實踐領袖的陶行知又有着怎樣強大的精神本源呢？筆者以為，有以下幾個方面：



1、深切的了解農村的生活，對農民有深厚的感情。陶行知在給操震球的信中如此描述農村生活：“……鄉下人也有城裡人想不到的樂趣，鄉間山青水秀，盡你遊覽。你早上可以看旭日東昇，引你興奮，晚上可以待月西山，助你吟誦。到了收成的時候，你手裡割着黃金似的稻子，那田家樂的山歌，不斷的洋洋乎盈耳，你還能親眼看見你所栽培的兒童個個桃李似的一年一年長大，一直到成家立業。”這種對農村田園牧歌式的描繪和教育成效的展望，吸引了對鄉村生活有情感和體驗基礎的熱血書生離開城市回到鄉村。

2、對當時中國的教育理念不滿，迫切希望改變中國教育現狀。陶行知先生認為，中國的傳統教育是為上層統治者服務的，主張勞心者治人，培養的是一批批舊官僚，這是沒有出路的；操震球也認為當時清華大學教育心理系學習的是一套外國教育理論，與當時中國的實際是對不上口的，更無法實現或學以致用。所以他們抱着一顆為人民大眾、為中國社會服務的教育初心，投身或獻身於中國的平民教育運動及鄉村教育運動，以期改變中國落後的教育現狀。

3、汲取西方教育理論精髓，培養活的切合中國實際的新型人才。陶行知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礎上，提出“生活即教育”，“社會

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主張，形成“生活教育”的思想體系。操震球則被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深深折服，認為唯有如此才能培養對國家真正有用的人才，培養那些在人民之中的老師，而不是培養高高在上的知識分子。如此，則需要與中國的鄉村相結合，甚至以農民為師。

4、把農村作為中國富強發展的希望。陶行知認為中國教育改造的根本問題在農村，他說：這個國家以農立國，人們十分之九八生活在鄉下，所以中國的教育就是到農村去的教育，就是到鄉下去的教育，因為農村如果沒有改觀，國家就沒有希望。他主張“到民間去”，用平民教育為“中國教育尋覓曙光”。他立下宏願，“我要使全體中國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要籌措100萬元基金，徵集100萬位同志，提倡開設100萬所學校，改造100萬個鄉村。他的目標是：讓“全村的農夫、農婦人人讀書明理，安居樂業。……全國的村莊都成為村民自有自治自享的村莊……”。於是，他脫下西裝，辭掉優渥待遇的大學教授，移居到南京郊外的一個極為落後貧困的中國普通村落，住到牛棚當中推展平民教育，帶領學生們自己耕作，自己勞動，自己修建校舍，使曉莊這個大學堂，得到很快發展。



5、具有無私奉獻的大愛之心。幼時受中華傳統文化的仁愛薰陶和少時基督教愛心思想的洗禮，使陶行知形成了甘為駱駝、捨己為教育的高度的自我犧牲精神，確立了淡泊名利、敢於變革的生活志向，擁有了以鄉村發展為樂的赤子之忱。這些大愛之心，成為陶行知甘願獻身鄉村教育的最重要的精神本源。

歷史上，總有一些人和事讓你心熱眼濕乃至潸然淚下。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也不斷會有埋頭苦幹的人、拼命硬幹的人、為民請命的人、捨身求法的人。這些人是中國的脊梁。而大凡為自己追求的事業而奮鬥獻身的人，他是一個傑出的人；藉此而功名就者，則可算一個偉大的人，其功績既可光宗耀祖，也能名垂青史。

陶行知喝了諸多洋墨水，受了諸多教育大家知識傳授，卻捨棄榮華富貴、功名利祿，選擇為中國最眾多的終身“鞠耕於隴上”的普通農民服務，並立志為農民讀書明理、安居樂業而努力，其相對那些為蠅頭小利投機鑽營、為功名利祿斯文盡失的讀書人，又是何等的高大，對人們心靈的震撼是何等的強烈。故此，陶行知是一個傑出的人——對教育事業有着赤誠之心，終生獻身於教育事業；他是一個偉大的人——奉行愛滿天下的格言，以學生成長發展為快樂，以塑造能服務於大眾的真人作為培養目標；

他是一個教育的聖人——天天學習，天天對自己進行再教育，以確保常教常新，不斷進步、不斷創新，不拘泥於傳統，不計較物質享受，惟覺教學之樂而無教學之苦……同時，他又是一個“捧着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具有大愛之心的大寫的凡人。

【說明】

本文引言主要出自楊鈞著《湘師春秋》第八章《第一任校長操震球同志在湘湖》及《陶行知全集》。

丁水娟

杭州科技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

茅佳清

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教研室歷史教研員

